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Report

第85期

2013年8月23日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办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Strategic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日本对“中国外交2009年大转变”的新主流认知与中日关系

日本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张云

2009年，日本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终结了战后长期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在外交上，民主党显现出自由主义的倾向。鸠山由纪夫首相强调“对等的日美关系”，并在加强对中关系基础上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在历史问题上，民主党态度积极，几乎没有首相和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小泉时期折磨着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明显退潮。据此，人们有理由期待中日关系在“中间偏左”的民主党执政后会大幅改善。然而，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中日关系不仅没有改善，相反却跌落至中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这是为什么？本文试从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流认知变化的角度对此予以回答。

日本主流认知变化：中国外交的2009年大转变

作为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亚太地区可能没有比日本对中国崛起更为敏感的国家了。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员村井友秀就在世界上最早提出“中国威胁论”的概念。不过，提出中国威胁的可能性并不等同于日本主流对中认知就是威胁。在1990年代初中日实力差距尚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崛起的话题在日本并未引起很多关注。日本知识界、政府和民众对此的关注是偶尔性的，相关认知也是零星的。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发展迅速，日本国内关于中国崛起是机遇

还是挑战有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讨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惠及面从日本大企业向中小企业扩展，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已经没有太多支持者。但在安全领域，日本对于中国可能构成挑战的认知此时有所抬头，主要体现在对台海问题的关注上。例如，2005年日美“2+2”会谈声明中，首次写入了日美同盟共同战略目标与台海局势和平解决的内容。此后中日经济力量对比变化明显（200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1/4，2007年达到日本的3/4，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军费增长快且缺少透明度，海军活动能力增强的观点在日本出现频率显著增加，但日本对中国外交认知的主流并不负面。主要认知为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对日本构成一定的潜在挑战，但是中国国家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会在坚持国际协调路线的范围内推进国防建设。换言之，无论从“意图”还是“能力”角度来看，中国都不会无限度“膨胀”。有趣的是，这一认知逻辑与同时期中国积极宣传的和平崛起及和平发展论非常相近。很多中国专家的分析认为，中日经济实力的逆转导致日本心理失衡，进而造成中日关系紧张。在我看来，这种判断可能过于简单化。

然而，2010年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流认知出现了明显变化的迹象。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中日经济总量的排名发生了逆转，而是“钓鱼岛撞船事件”带来的冲击对上述主流认知提出了挑战。“撞船事件”和随后在中国发生的反日游行，以及日本媒体报道的中国对日本采取稀土禁运，停止各类交流活动等为保守派政治家、部分学者和民众提供了挑战原有的“中国和平崛起·有限潜在挑战”的主流认知的材料，而支持上述主流认知的人士则开始面对如何解释看上去同过去的认知“相矛盾”的中国外交“新动向”。日本民众似乎也迫切需要有人告诉他们“为什么中国人这样进行反日游行，为什么中国政府如此‘高压’”。在这个突发事件的巨大冲击下，原有的认知发生动摇，认知的新需求促动了新的认知产品的产生。

笔者并不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已经从原来的“中国和平崛起·有限潜在挑战”根本性地转变为“中国武力崛起·对日现实威胁”。但是认为“中国变了”的新认知正在逐渐成为主流却是事实。其主要内容包括：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的大国意识被突然激发，自信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在2009年发生了重大转变，过去的经济发展优先的“韬光养晦”政策发生改变，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变得日益强势，于是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同周边国家产生争端。更加激进的观点还有，认为中国对外关系定位正从“负责任的大国”向“建立中华秩序”的方向发展，并且认为“北京共识”可以超越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路线的“华盛顿共识”。还有的认为中国外交已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等等。

日本政府的官方表态从2010年后也体现出与知识界类似的认知倾向。2010年的《防卫白皮书》中还仅仅指出“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飞跃发展，在金融危机中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自信增加。”2011年的《防卫白皮书》则直接指责中国的“高压”态势。2011年版的《外交蓝皮书》则指出，“2010年，围绕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二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以美国为中心的发达国家同中国之间的主张有差距，产生了中国主张的核心利益同各国之间的种种矛盾。”

按照上述逻辑，日本对中国外交的主流认知在过去三年中倾向于认为中国国力日益增强，国内舆论多元化，军队主导外交，中国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变得对日本日益强势和高压。对于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日本认为必须要“毅然”对应，退让只会给中国进一步“得寸进尺”提供可能，而不会获得“中日友好”。安倍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认为自己“对中国几乎没有让过步”，过去的中日关系是建立在“日本削减国家利益制造了友好的状态”的前提下，潜台词就是现在需要让步的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日本新主流认知的脆弱性和可重塑性

很多读者看到这里可能会想，既然日本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已经上升为主流，那么中国无论做什么都将徒劳的。这里就涉及一个“认知改变”的问题。的确，一个主流认知的改变并非易事，因为认知不仅具有保持连续性的倾向，还有固化的特点。但也要看到，主流认知本身也存在是否合理和是否可塑的问题，不应当人为预设目前日本的主流负面认知是既定和不能改变的，那样做的结果将会导致决策者政策选择自由度的减少。

首先，日本的新认知形成的时间短，认知的逻辑和实证基础并不扎实。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本的新认知的出现始于2010年下半年，距现在仅3年。与此同时，目前出现的日本对中国外交的新认知的产生并不是基于日本对中国国家战略和对外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是为了应对所谓的中国“强势外交”的短期迫切需求而作出的新的解读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是知识性的短期供需关系的不匹配所造成的。虽然日本认为中国外交在2009年发生了大转变，但这一认知并非产生于2009年，而是为了紧急回应“撞船事件”处理过程中中国的“变化”与原来的主流认知之间的不相容才重新编辑过去的信息来匹配新认知。新认知并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很好地服务于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和平崛起道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就一定会被简单地放弃？而且日本知识界的相关解读较多出现在媒体评论、时事杂志而非学术论文中。新认知的很多内容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缺陷，例如，如果说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是因为经济实力增长后的自信

而导致的路线变更，那么如何解释 1995—96 年中国还未崛起时应对台海危机时候的“强硬”立场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一新认知的基础并不牢固。

第二，日本新的认知并没有完全形成和固化，原有的较正面的认知还没有被完全破坏，目前的负面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逆转的可能性。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新的认知的重要逻辑基础即中国持续高增长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大变化将会受到质疑。如果继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中国的首要目标，中国将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那么原来的主流认知的逻辑就很有可能会重新回来。皮尤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认为中国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的日本民众从 2011 年的 37% 下降到 2013 年 24%。按照日本的新认知，一个日益强硬的中国的逻辑结果应当是中国对外关系出现全面紧张。中美冷战、中国同东南亚关系恶化等比较符合这种认知的预期。但中美对话畅通，首脑会晤频繁，中国继续奉行积极的地区主义政策将很容易削弱新认知的有效性。新的认知不能固化，旧的认知便仍将有效。

第三，日本主流认知受美国对中国主流认知的影响程度很深，在政策认知和形成上日本高度依赖美国。日美是同盟关系，而且是不对等的同盟关系，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的决策上，也反映在通常不那么显眼的思想传播、认知影响和舆论形成等软的方面。战后日本在对外关系上从精英培训、学术训练到情报获取和媒体传播等各个方面都高度依赖美国，美国对华认知的变化会明显影响日本对中国的看法。上述 2010 年下半年日本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同该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认知的变化有一个半年左右的时间差，但内容非常相似，即认为中国变“强势”了，日本方面也多次引用美国指责中国强硬的证据。今年以来，美国开始出现反思所谓的“中国强硬论”以及基于此认识而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危险性的论调，这对日本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总之，在对日外交中既要充分认识到 2010 年后日本出现的对华负面新认知的危险，同时也不能对这一危险予以过度评估，要看到其内在的脆弱性和可重塑性。通过各种方式，努力使日本的主流对华认知从“中国变了”向“中国并没怎么变”的方向逆转，将会对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场智力游戏中，真正受到考验的很可能是两国知识界的能力。

编辑：侯颖丽 审核：王缉思
网址：www.ciss.pku.edu.cn
邮件地址：CISS@pku.edu.cn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邮编：100871
电话：86-10-62756530 传真：86-10-62759302